

## 我们党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达到新高度

王振中

中赢得战略主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社会创造的两大奇迹已经证明了这样的道理，只有更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更好确保“放得活”“管得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加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是一个重大跨越

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正在于突破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传统认知束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不断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从改革初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则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认识也持续深化，实现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跨越。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表述演变，清晰回答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与政府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问题。这一表述变化绝非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经35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我们最终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判断，确认了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逻辑所衍生出的、符合规律的科学理论演进过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而不是起全部作用

西方学者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探讨，长期偏好

无限延伸“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功能，但即使是西方学者，也看出了这一偏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曾说：“在亚当·斯密百万余字的传世之作中，‘看不见的手’的表达只出现过三次，且没有一次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复杂的国际贸易有丝毫关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有为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所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时，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就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要讲辩证法和两点论，在社会发展的有机体中，处理好两者相结合的适配范围。欲达此目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内涵就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有效市场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就是要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公平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国家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但是对有为政府的作用却容易忽视或贬低。

恩格斯十分重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他分析了三种可能：一是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二是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三是国家权力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对于这三种反作用，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积累了丰富的教训，仅靠有效市场既不能助推社会和谐，也不足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发挥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而不是不作为、慢作为，更不是乱作为。

实践证明，如果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仅发挥有效市场力不从心。例如，解决仍然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果仅靠资本的自由选择，那么只会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就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还例如，解决国内大循环存在的卡点堵点，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加强和优化政府监管；再例如，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政府统筹推进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还要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尤其是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的地方，“无形之手”是不存在的，只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才是唯一出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  
党性问题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新解说。“‘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并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党员的党性，是政党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的内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性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人民性、实践性的有机统一。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弱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看，坚持实事求是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

## 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曾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

基层，是党员干部掌握具体实际、锤炼优良作风、提升能力本领的主阵地，更是服务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最好考场。党员干部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基础在于搞清楚“实事”，关键在于“求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和基本功。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培育和影响了大批共产党人。在一辈革命家中，陈云就是善于调查研究的典范。他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十五字诀”，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掌握。

## 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贯穿始终的在于一个“实”字——“干实事”强调干事态度要实，“谋实招”注重方式方法要实，“求实效”突出工作成效要实。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就是要做务实之人，挺膺担当、真抓实干，拎着“乌纱帽”为民办实事，而非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要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如墩子般抓落实，扎实办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切实解决好人民急难愁盼，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 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

袁婧

创新是多层面  
系统性工程

贺东航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首要任务，深刻把握全球发展大势，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核心路径。深入理解“创新城市”的丰富内涵，结合武汉具体实践进行探索，对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科技创新是创新城市的“硬核”支撑

建设创新城市，本质上是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革新，而是一个涵盖了科技、产业、生态与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工程。

创新城市必须是重要科技策源地。这就要求城市不仅具备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扎实的基础研究与前沿攻关能力，还要构建高效协同的“政产学研用”融合机制。政府应更加注重战略引导、环境营造与服务赋能，通过制定前瞻规划、搭建高水平平台、组织关键技术攻关，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武汉的实践路径强调“打破围墙、推动融合”，一方面通过实施“光谷科创大走廊”等重大战略规划，物理上将东湖高新区的产业集群与周边的大学城、科研院所紧密串联起来，形成了空间上的创新集聚区。另一方面在制度上积极创新，大力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如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在组织架构、人事制度、经费使用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能够更灵活地围绕市场需求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积极搭建各类产学研合作平台，如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共享实验室等，有效降低了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合作门槛，加速了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的进程。

## 夯实产业创新经济基础

科技创新价值最终要通过产业化来体现。创新城市必然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它要求城市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定不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构建富有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替换，而是要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紧密协同的产业集群。产业政策需更加精准，从普惠性支持转向重点培育产业链关键环节、优化集群生态与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武汉立足自身产业与科研基础，实施“聚焦优势、集群发展”策略，集中力量打造“光芯屏端网”、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依托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光谷），已形成从材料、器件到设备、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并在多个细分领域引领全球。这种聚焦主航道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汇聚资源，培育出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

## 营造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

创新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孕育和生长。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该包括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协同的组织网络、功

能完备的硬件设施、活跃多元的资本市场以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各类创新主体在其中相互依存、彼此赋能。其中，风险投资、科技金融如同“活水”，对于发现和滋养创新幼苗至关重要。

因此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的优劣，不仅要看其拥有多少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更要看其能否有效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能否为创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与支持。

武汉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大力实施“学子留汉”工程，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科技金融创新，引导资本聚焦科技创新。创新文化也在日常中滋养，开放、频繁的非正式交流场景，正是城市创新活力的一种体现。

## 鲜明的创新精神是城市最宝贵的灵魂

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更是精神文化的家园。一座真正的创新城市，必然洋溢着一种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冒险、宽容失败的精神气质，深刻影响城市中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不竭源泉。创新精神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积极引导和塑造。

例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让创新者的智力成果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从而激励更多人投身创新创业；改革教育和人才评价体系，能够引导社会从关注“标准答案”转向鼓励“奇思妙想”，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宣传和表彰杰出的创新人物和事迹，能够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皆可创新的浓厚氛围。

在创新精神培育上，武汉展现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品格。武汉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也为创新精神的成长提供了土壤。无论是对海内外高端人才的真诚吸纳，还是对青年创业者试错探索的宽容与支持，都体现了一座城市在拥抱不确定性、鼓励冒险探索方面的胸怀与气度。这种精神层面的塑造，虽然不如物质建设那般显性，却是决定一座城市创新之路能走多远、能攀多高的根本性力量。

如今，“创新”越发成为这座英雄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对创新城市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更像武汉一样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正在汇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用好城市更新  
这个重要抓手

求知

周刊

8 长江日报

2025年12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刘功虎 美编：陈昌

版式：夏洋 责校：文胜

青马在线

特色假期要体现  
“生活即教育”

杨江楠

2025年12月，新疆阿勒泰7.3万名中小学生度过了全国首个为期9天的“雪假”，吉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启了专属“冰雪假期”。在“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孩子们脚踏传统毛皮滑雪板穿梭于雪原；在冰雪资源富集的吉林，青少年在免费开放的雪场中驰骋竞技，一时羡煞众多网友。

近来，各地特色假期不少。在广东，学生或走进智能制造工厂，或参与农耕流程。在宁波，“秋假+周末”模式为实践腾出整块时间，鼓励学生进行博物馆研学、社区志愿服务等。

放假就卷学习，是不少地方的尴尬局面。吉林、阿勒泰的“雪假”，广东、宁波等地的“春秋假”，让人们看到一种新的尝试，将生活场景转化为立体课堂，生活即教育。

运动本身就是课堂。比如滑雪，孩子们从雪具穿戴到安全摔倒，无不是力学原理；从初级雪道的胆怯到进阶赛道的从容，每一次突破都是意志的锤炼。当地教育局联合雪场提供免费教学、双语指导，让冰雪运动成为集体能训练、风险判断、团队协作于一体的综合课程，实现“体验中学习、实践中成长”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特色假期加深了孩子与故乡的情感连接。中国地大物博，风景各异，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地理风貌、文化习俗，乃至性格习惯都大大不同。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化，首先就是爱家乡，在对家乡具象的情感中，感受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深厚连接。

因此，特色假期的核心是地方特色。比如，新疆的“雪假”，正是锚定了地域特色资源。全国多地在推进假期改革中，也应特别注意立足本土禀赋，做好配套政策支撑。沿海地区可依托海洋资源探索“蓝色假期”，组织海洋科普、渔业体验等实践活动；山区可深挖生态优势开发生态研学假期，让学生在山林考察中领悟自然价值；历史文化名城则可打造“文化传承假期”，通过非遗体验、古迹研学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地域特色与育人目标的深度适配，让特色假期真正接地气、有温度。

设计好特色假期，也需多方发力。学校应设计结构化、可操作的假期实践任务，避免“放羊式”管理；教育部门须强化督导，对违规加课、放任不管等行为及时纠偏。政府需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弹性休假或“亲子陪伴假”，弥合家校时间差，并通过政策引导撬动文旅、社区、博物馆等公共资源开放共享，打造安全、公益、就近的“第二课堂”。既保障了教育公平的实质落地，又激活了冬季消费，让假期成为滋养生命成长的沃土，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体悟真理，让教育在广阔天地中自然拔节、蓬勃生长。

（作者单位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